

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

中国：走向成功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

● 魏新生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

中国：走向成功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

● 魏新生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

中国:走向成功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

魏新生 著 责任编辑 张志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郑州邙山书刊装璜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45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15—02393—1/D·500

定价 7.80 元

DH23/50

前 言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现时代的东方有一头醒来的睡狮，她的名字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从中国两字之间多了“人民共和”几个字，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便开始了。

于是，便有了许多新的、曲曲折折的故事；便有了人们评说自己的创造的权利；便有了“本朝人不写本朝史”的历史惯例的结束；也便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

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庇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从揭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既往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某些“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们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

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而以郑重的态度对待人们的历史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当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刘德福

谢春涛

1993年1月

目 录

引 言	(1)
一、转折与开端	(8)
真理标准大讨论	(8)
“中心”的定位	(19)
活水之源	(26)
擎天四柱	(33)
二、经济“新政”	(42)
辨“症”开“方”	(42)
“鸟”“笼”关系	(50)
“包”公开堂	(58)
开放的学问	(68)
三、政治重构	(76)
民主问题：制度与目的	(76)
精神文明：特征与目标	(85)
统一战线：阶级联盟到政治联盟	(93)
党的领导：坚持与改善	(101)
四、初识正道	(111)
历史的反思	(111)
指南的校正	(120)

他山之石·····	(128)
主题渐现·····	(135)
五、改革开放理思路·····	(143)
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上)·····	(143)
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下)·····	(150)
摘桃曲与人才谱·····	(159)
政体改再理“头绪”·····	(168)
滚动式开放曲·····	(175)
六、放眼世界新思维·····	(184)
“一国两制”的构想·····	(184)
“东西南北”问题·····	(192)
跳开“一条线”·····	(200)
走出“盘马弯弓”的思维圈·····	(208)
七、挑战与探求·····	(215)
发展战略初觅·····	(215)
“忧”势与优势·····	(222)
在双重考验面前·····	(231)
“两个基本点”·····	(237)
八、里程碑·····	(245)
初级阶段论·····	(245)
新灯塔·····	(255)
生产力标准·····	(261)
方略与蓝图·····	(270)
抉择与震荡·····	(278)
九、风波过后·····	(287)
初回首·····	(287)

两手抓·····	(295)
探新标·····	(301)
再归纳·····	(309)
十、并非最后一章·····	(316)
南国风起·····	(316)
继往开来·····	(327)
经济模式新论·····	(337)
初成理论正果·····	(346)
十一、尚未结束的结束语·····	(355)
后 记·····	(360)

引 言

(一)

当人类社会进入 19 世纪 40 年代，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世界范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张自己的势力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敏锐地看到并向世人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在资本主义的故乡徘徊。为此，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兴起和胜利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从此，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而奋斗着、探索着，写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的篇章：

1917 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在俄国大地上变成了现实。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并发展壮大起来，世界历史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又过了几十年，当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东欧，在东亚，甚至在拉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应运而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

正象此前一切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经历了曲折一样，当 20 世纪的历史进入 90 年代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东欧诸国、甚至在苏联大地出现了严重挫折。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却在曾经创造了人类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大地上迎风招展，显示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这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敌视者来说，都是一个引人注目、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对此，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不同的视角，固然可以给予多方面的解释。然而，当人们的目光凝视中华大地上这面光辉的旗帜时，他们似乎明白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因为这面旗帜上醒目地写着：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

当中国历史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近 30 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经过 7 年凯歌高奏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期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时间更漫长、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意义也更深远的新的长征。然而，历史在赋予他们这一新的重任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完成这一重任的充分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建设

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或模式，而长期处于戎马倥偬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也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和经验，但其缺点和弊端也在暴露，包括苏联人自己也开始进行反思和总结，中国的国情不同，当然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把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上一开始就走上了自己的路。但历史证明，这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尤其是在找到正确的道路之前，它呈现出一个颇为曲折的历程。

这种探索曾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1956年春天，毛泽东就通过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和党与国家工作的总结，并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至关重要的10个方面的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数月以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国内虽然还存在阶级斗争，但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指导思想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历史表明，在此后社会主义

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探索中，实际表现出和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正是这两种趋向的消长变化，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路程。

一种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譬如，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及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等观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以及公有经济、计划生产是主体、个体经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此外还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情况的制度和条例。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正确趋向未能在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始终占据支配地位。

另一种趋向是错误的趋向。就是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

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未能正确地领会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有关原理，或者未能正确地分析中国国情，没有能够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突出表现为“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中的扩大化错误。这种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暂时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产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持续 10 年之久。由于这种错误趋向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非但没有取得更大成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和损失；本来是想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发展道路，但却在许多方面因袭、甚至强化了苏联模式，譬如形成了高度集中、僵化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步入了“误区”。

（三）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从此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误区”，步上了正轨。实际上与此相反，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提出和贯彻的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

针，其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拨乱反正工作虽然已经局部展开，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深入下去，政治形势春暖还寒；国民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旋而又陷入“洋跃进”的境地，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仍然在“左”的轨道上沿着错误的趋向滑行。

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虽然被压了下去，但它却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抛弃和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仍然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提出的一些正确观点，以及发生在1972年的纠“左”，1975年的整顿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些正确的趋向不仅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局部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迅速积聚并走向成熟，开始向社会主义探索中的错误趋向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挑战和冲击。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这样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

这次不再令人遗憾：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历史性关口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继承并从根本上发展和深化了此前社会主义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逐步反思并汲取了错误发展趋向的教训，终于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探索道路。

显然，这里所说的走上了正确的探索道路，并不等于说已经走出了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对于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坎坷曲折的历程来说，它意味着从此走上了正道；而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言，它仅表明真正的探索才

从此开始。

本书所要展示的，就是从此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探索的全景。

一、转折与开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在探索和开拓着一条自己的路，但却在长时间内未能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正确的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又一次处在历史性关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前途和命运的抉择：坎坷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左”的歧途上继续下滑，还是改弦易辙，走出“误区”，开辟蹊径？通过对历史经验认真的、甚至是痛苦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走自己的路，但却绝不能再继续走原来的路！在反思的过程中和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产生了以这次全会命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执政党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由此真正发端。

而这一切，是由一场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拉开序幕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

公元 1976 年的金秋 10 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征的

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变成了欢声笑语加旗帜的海洋。由于“四人帮”的被粉碎而兴高彩烈的人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和憧憬：拨乱反正，实现安定团结；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

然而，人们的这种期望很快便蒙上了一层阴影：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两报一刊社论的方式传达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声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尚沉浸于欢乐的人们冷静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那场未放一枪一弹就使“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漂亮行动，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大动乱局面的结束，但却并没有给导致这场大动乱的“左”倾错误划上句号。在“两个凡是”的方针下，深孚众望的邓小平不能马上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难以平反，“大干快上”仍是经济建设的定弦主调，阶级斗争照旧被视为全党全国的张目之纲。一切都似乎变了，又似乎一切都没有变；我们应当走向未来，但却总觉得走不出过去。事实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建设通向新时期的历史道路，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变为坦途，而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便是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这样，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走出“误区”、进入新时期所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的一场战斗。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打响了这场战斗。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及华国锋、叶剑英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